

# 民族性:《百鸟衣》经典建构的主导因素

□ 钟世华

少数民族诗歌通常具备鲜明的“民族性”特征,以民间故事、传说为主体的诗歌创作是其独特的资源优势。需要指明的是,这种创作并非是对已有故事、传说的简单整理或改写,而是必须经由诗人自身的思考、锤炼与想象。对于少数民族诗歌来说,由“民族性”的再现而生成的“原创性”与“陌生性”是其成为经典的独特优势,壮族诗人韦其麟的《百鸟衣》正具备了这样的特性。

学术界关于《百鸟衣》“究竟是韦其麟的整理还是创作”这一问题有着不同的声音。比如肖云儒认为它是韦其麟整理而成的长诗,与其相对的还有刘公整理的长诗《阿诗玛》。宋允兴则对肖云儒的观点提出质疑,他指出:“《百鸟衣》完全不是根据民间原有的长诗整理出来的产物,而是韦其麟以民间故事为题材所创作的一部长诗。”而洪子诚与刘登翰所著的《中国当代新诗史》谈到了该诗为韦其麟“创作”而成:“《百鸟衣》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,是根据民间传说重新创作的叙事诗中成就较为突出的一部。”此外,韦其麟关于写作《百鸟衣》的描述,也从根本上说明了该诗的“创作”属性。综合来看,笔者认为《百鸟衣》是由韦其麟创作而成。虽然该诗的创作原型取自“壮族民间传说”,但韦其麟在创作过程中加入了自身的创造性思维,这使得诗作本身具备了鲜明的壮族特性。

一、《百鸟衣》在壮族民间故事的基础上生成,带有强烈的壮族特色。韦其麟曾将“民间故事”定义为“劳动人民口头创作中的一种体裁,通常是以通称的人物、广泛的背景、完整的情节来表现生活的散文叙事作品。”《百鸟衣》中尽管没有“通称人物”,但它有“广泛的背景”与“完整的情节”,因此整体上属于民间故事的再创作。就具体的写作而言,《百鸟衣》更多地符合壮族民间故事中的“幻想成分占主导”的类型,这是因为韦其麟在展现古卡和依哩的人物形象时,掺杂了较多的幻想性因素,如形容古卡力气的诗句“别人的扁担,一条用十年;古卡的扁担,一年换十条。”“上千斤的大石滚,十

个人才抬得动,古卡双手一掀,轻轻地举起像把草。”而依哩由“大公鸡”变化而来的情节设置“第三个月第三朝呀,不听见公鸡啼了,笼子里没有了公鸡,院子里站着个姑娘”则更带有幻想的色彩。

二、从故事情节来看,以古卡和依哩为代表的劳动人民,同以土司为代表的封建统治者之间进行了艰苦的斗争,这种斗争立足于壮族特有的历史实际,同样具备鲜明的壮族色彩。土司制度在广西延续了较长时间,其漫长的历史也极大地影响了广西人民的生活。“土司”及依附于其的恶势力在《百鸟衣》中以“反面”的典型存在,韦其麟借助“蛤蟆”“狗龙蜂”“咪屎虫”等物种,对其进行了极端的丑化,如诗句“土司想着依哩,口水流了三尺又三寸;蛤蟆见了天鹅,睡不着三天又三夜。”“狗龙蜂从粪巢里飞出,是要把人伤;土司的狗腿出衙门口,是要把依哩抢。”“粪堆里的咪屎虫,满肚子是粪;衙门里来的狗腿,句句是接土司的嘴。”这些人物的存在,不仅对该诗的情节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,而且其本身是壮族特定历史时期的代表,在突出壮族的“民族性”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。

三、整体上看,韦其麟在《百鸟衣》中以其深刻的民族自觉诠释了壮族的民间故事,使得原本较为“沉寂”的壮族文化得到了更为广泛的传播与接受,正如学者梁庭望所看到的:“解放初期的广西,在人们眼中,还是偏僻落后之地,但《百鸟衣》的出现,证明了广西并非文学荒地,新中国的少数民族中也不乏精彩的文学作品。叙事诗《百鸟衣》发表后,以其浓厚的民族色彩、地方色彩和神话色彩吸引了大批读者,并引起了全国对广西文化、对壮族文化的重视。”除对壮族民间故事的创造性诠释外,《百鸟衣》还通过富于民族、地域色彩的抒情艺术,诠释了壮族的“民族性”内涵。作为叙事长诗,《百鸟衣》通过民族文化风物的再现,富于民族化的修辞以及诗体形式“变奏”等方面,展示了壮族的文化色彩与广西地域特征。

第一,《百鸟衣》中有着壮族文化风物的集中再现。“百鸟衣”作为长诗的主导意象,不仅作为串联故事的线索,而且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,我们从中可以窥见壮族的文化特性。“百鸟衣”尽管在长诗中出现的次数很少,但它的作用不可或缺。从依哩被土司抢走时对古卡的提醒——“古卡呵古卡,心里别害怕,你去射一百只鸟做成衣,等一百天找到衙门里!”到“百鸟衣”的生成——“一百张鸡皮,张张一样美,缝成一件衣,羽光亮闪闪”再到古卡凭借“百鸟衣”将土司杀死,故事被不断推向高潮,独具壮族特色的民俗文化也集中传达出来。

第二,《百鸟衣》还通过富于民族化的修辞,表现出了浓厚的地域色彩。韦其麟在诗中经常运用了一种特殊性的比喻方式——以动物喻人,以此来表达自身的爱与恨,如:

土司想着依哩,口水流了三尺又三寸;蛤蟆见了天鹅,睡不着三天又三夜。  
乌鸦叫喳喳,狗腿两边排,孔雀拖进了狼巢,依哩进了衙门口。  
老马驹你不识羞,老马驹你面皮厚……  
画眉关在笼子里,有翼不能飞;依哩住在衙门里,有脚不能逃。  
恨不得长上翅膀,像鹰一样飞。恨不得多生两条腿,像马一样奔。

这些诗句中,韦其麟针对不同的人物表达了不同的情感,他用“雄鹰”“骏马”“孔雀”“画眉”等动物来比喻勇敢的古卡与美丽的依哩,而描述土司及其狗腿时,他则以“蛤蟆”“乌鸦”“老马驹”等丑陋的动物来形容,这便充分地表达出了他的情感倾向。韦其麟的这种比喻方式与壮族民间文学中“动物故事”所使用的修辞方式相互吻合。因为在他看来,“动物故事”是壮族民间故事的重要组成部分,“按形式来说,是动物故事,而它的内容,绝大多数却是人的故事,反映的是人们对社会生活的种种感受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。”

第三,《百鸟衣》还通过诗体形式的“变奏”,

再现了壮族诗歌丰富的形体内涵。《百鸟衣》尽管以“四行体”为主,但每行的字数并不“等同”,从而摆脱了单一写作形式的壁垒。更关键的是,诗中不时地穿插2行、5行、8行等诗节,甚至还采用了12行的“大节”来描述故事情景,这就使得整首诗的形式更为灵活,而不是拘泥于“4行”的套路之中。从内容上说,这些“变奏”了的行数有不同的侧重,如“2行”主要描述的是人物之间的对话,“5行”及更长的行列则将对话与叙述灵活地连接起来,使得叙事与抒情紧密结合。同时,这种诗体形式的“变奏”也赋予了诗人的感情以更为生动的变化。

综合来说,韦其麟的《百鸟衣》以“简洁的诗句”容纳了“深邃的思想内涵和丰富的艺术情趣”,更为重要的是蕴涵了丰富的民族情感,为壮族诗歌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。鲜明的“民族性”使得《百鸟衣》具备了成为经典作品的基本特质,这种特质一方面指向的是其作为“壮族诗歌”的优秀代表,由此生成了壮族身份及文化的自我认同,诗人依靠着独具壮族特色的诗歌写作,使得作品在当代诗歌中经由“少数民族诗歌”的身份介质获得了较高的诗学地位,尤其形成了以“壮族”为核心的想象共同体,为经典特质的培育作出了贡献。另一方面,《百鸟衣》所再现出的“民族性”在与“地域性”的对冲中营构出持续的紧张感,从而形成壮族文化与广西地域之间的内部张力,为作品传播场的建构提供了有效的智力支持。抑或说壮族文化与广西地域通过相互的借重,产生了新的诗学维度,为《百鸟衣》的传播制造出了自主的场域空间。《百鸟衣》的经典建构离不开其自身的“民族性”特质,加之外部评价机制的不断助推,使它在少数民族诗歌史,乃至当代诗歌史中最终走进“经典”的行列之中。

(作者系山东大学文学院现代文学专业在读博士,南宁师范大学教师,文学创作二级,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诗歌研究与评论。)

# 藤县龙母庙和龙母文化

□ 周雄

据说,龙母生于楚怀王辛未年(公元前290年)的古藤州一都水东街孝通坊(今藤州镇胜西村),距今有2300多年。民间传说龙母是古代的“活雷锋”,她率领百越民众与自然灾害斗争,使黎民安居生息繁衍,她“利泽天下”的民本思想深得民众拥戴,被推为仓吾氏族领袖。传说她赡养五龙,得龙子相助造福黎民,被尊称为“龙母”。

千百年来,龙母崇拜在藤县、西江流域、珠三角及港澳等地广为流传,甚至由华人华侨传播到东南亚一带。

## 史书对藤县龙母庙的记载

有关龙母的籍贯,南朝沈怀远在《南越志》说:“昔有温氏媪者,瑞溪人也。”这是有关龙母的最早记载,距今有1500多年。此后,《肇庆府志》《德庆城志》《南汉春秋》《广东新语》《粤中见闻》等史籍,均有记载。

清卢崇兴《悦城龙母庙碑记》(碑刻于康熙二十七年)云:“龙母之先,粤西藤县人也,本姓温,父天瑞,取程溪县梁氏,遂家焉。”

清程鸣《孝通庙旧志》云:“敕封护国通天惠显德龙母娘娘,温氏,晋康郡程溪人也。其先广西藤县人,父天瑞,宦游南海,娶悦城程溪梁氏,遂家焉。”《肇庆府旧志》也言龙母乃藤县人。

梧州地方志《藤县志·卷六》,对龙母做了更精确的考证:

“按龙母嬴秦时之神也。温姓或蒲姓,今粤东肇庆府旧志及悦城孝通庙旧志,咸以为藤县人,则无论疏于何都,其为藤县之神固可考核而无疑者。然其墓独在悦城,何也?父天瑞娶悦城梁氏,生三女,龙母其仲也。随其母到悦城,心喜其地,欲以为安厝所,因熟记之,及

归于溪也,得石卵,剖之出五物,如守宫状,喜水,母胎渐长,放之江遂去,越数年,鳞甲辉煌,复来见母,母知龙子之远迎也。别其父母曰:儿当乘龙至悦城,遂跨龙,薄暮抵江口,登岸得道,五龙以风雷相护。一夕,地拥成坟,人以为异……”

据统计,历史上西江流域至少有7座龙母庙,而其中的广东德庆县悦城龙母祖庙、梧州龙母庙和藤县龙母庙的影响力最大、认可度最高。

北宋乐史撰《太平寰宇记》记述了藤县龙母庙的具体位置:“龙母庙在州东枕容州江口焉。”容州江口,即北流河在藤县的河口(北流河经古容州向北流至古藤州,故名容江),亦即今藤县藤州镇胜西村龙母庙所处的位置。西胜村的藤县龙母庙有龙母庙印章,蛇身狮面神尊一尊、莲花柱墩,以及雕刻有“龙母娘娘”字体香炉等文物。

广东悦城龙母祖庙的名称,与龙母的出生地——古藤州一都水东街孝通坊有密切关系。《悦城龙母祖庙》言:悦城“龙母庙的名称几经变迁。据《南汉春秋》所载,庙旧名‘博泉神庙’,不知何解。宋时先称‘永济行宫’,后改为‘孝通庙’。此后‘孝通庙’与龙母庙并称。”

宋《大观二年八月七日牒文》有:“敕宜赐额‘孝通坊’为额”的记述。据龙母文化研究专家叶春生考证,悦城龙母庙“在宋代大观戊子年(1108年)被宋徽宗赐额‘孝通庙’。”

## 藤县龙母文化内涵丰厚

龙母是千百年来西江流域民众崇敬的水神。藤县县城处于西江主干流浔江与北流河汇集的大江大河边,龙母祭龙的古迹至今犹存。



藤县龙母庙

藤县的“祭龙潭”“迎龙洲”“龙颈”“龙湾”“龙巷露台”“石龙”“龙巷村”“龙腾峡”等地名的传说,都与龙母有关。

藤县县城文岭风景秀丽,灵气独钟,常有五色云雾绕于顶上,故名“文岭云环”,为古藤州八景之一。岭下山环水抱,蜿蜒起伏。五道山麓各向水边伸展,再若五龙戏水,中间山麓沿藤县中学走向,至现县图书馆一带,便是龙颈(地名“龙颈”因此得名),伸至北市场对出的江心便叫“龙湾”(又叫“龙潭”),相传为龙母祭龙之所。

“龙潭”充满神奇色彩。同治《藤县志》绘声绘色记载:“龙潭湾在县治正北江中,亦曰潭津(唐贞观时设藤州府潭津县,为州治所),潭深无际,水落石出人践之,足音下,应时或水涌,顷刻数丈,泛滥波涛,移时复平,传其下有卧龙。”

藤县的龙母之迹历代有诗人吟诵。明永乐举人、茶陵州训导傅惟宗有诗《龙湾》:

石窟藏灵自古闻,碧波无底浸江滨。水枯忽涨二三尺,岁熟加收四五分。神物蜿蜒蟠地轴,灵光焱焰动天文。

太平有象今全见,白日晴嘘五色云。清嘉庆藤县知县高攀柱有诗吟咏“龙湾”:霖雨鸿濛戏九垓,身闲常自卧江隈。穿渠不陋偏成巷,破壁通灵应号台。误入迟回询八阵,独登潇洒望三苔。嘘云变化原难测,得济苍生便异才。

广东德庆县因龙母缘,历来与藤县民间往来密切。每年农历五月初一龙母诞、八月十六龙母得道诞日前,德庆县都有派人请龙母娘家藤县选出四位良家妇女,到悦城龙母庙留夜为龙母更衣沐浴的习俗。

藤县民众也有在“龙母诞”“龙母得道诞”两个诞期,到藤县龙母庙或悦城龙母庙参拜龙母的民俗。藤县龙母庙有良家妇女到悦城庙为龙母更衣沐浴送行的仪式,以及道公喃道、“龙母巡游”“引龙”“放河灯”等一系列敬龙母活动。

千百年来,龙母崇拜在西江流域、粤港澳等地流传甚广的现象,深刻体现了劳动人民对生活的朴素追求,是我们研究西江流域文化不可或缺的内容。